

UDK 339.727.24:327(510)  
339.92(510:100)  
评论文章  
投稿 25/05/2021  
收稿 31/05/2021  
doi: 10.5937/napredak2-3239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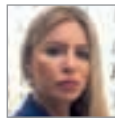
萨尼亚·阿雷齐纳<sup>1</sup>

香港大学, 香港, (中华人民共和国)

塞尔维亚共和国政府, 贝尔格莱德 (塞尔维亚共和国)

# 作为“负责任大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的对外投资援助模式

PR China as a „Responsible Great Power“ – The Chinese Model of Foreign Investment and Assistance



**摘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 就开始实行对外投资援助政策。尽管在随后的几十年里, 其动机各不相同, 但中国领导层从未放弃将外国投资和援助作为中国外交政策核心部分的决定。证明中国对外投资和援助模式发展的主要原因是中国领导层意图表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有助于解决重要全球问题的“负责任的大国”这一基本假设, 在努力实现2049年实现“中国梦”这一最重要目标的同时, 作者运用了结构功能分析、比较分析等方法。

**关键词:** 中国, 负责任的大国, 中国梦, 投资, 援助

**Summary:** Shortly after its establishment,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began to implement a policy of providing investments and assistance abroad. Although the motives for this were different in the decades that followed, the Chinese leadership never gave up on the decision to make foreign investment and assistance

---

1 sanja\_arezina@yahoo.com

a central part of the Chinese foreign policy. To prove the basic hypothesis that the main reas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model of foreign investment and assistance is the intention of the Chinese leadership to show that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s a „responsible great power“ that contributes to solving important global problems, while working to achieve the most important goal – achieving „Chinese dream“ by 2049, the author uses structural-functional analysis, comparative analysis.

**Keywords:** China, responsible great power, Chinese dream, investments, assistance

## 介绍

自1921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秘密会议上成立以来，整整一个世纪过去了。在赢得内战后，这个党于1949年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随后的几十年里，党的领导把这个经济和社会遭受破坏、国际孤立的国家设法变成了国际社会中的一个强大而有影响的成员。尽管党的领导换届，环境变化频繁，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设定的目标依然不变——为人民提供足够的食物和能源，收回中国所有领土，巩固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Arezina, 2018年，第15页）。因此，可以说，中国衡量国力和自尊的基本标准被总结成两个词：团结和稳定。

按照这些目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开始实施对外投资和援助政策。尽管此后几十年，中国领导人的动机不同，但中国领导人从未放弃将投资和对外援助作为中国外交政策的核心部分的决定。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北京为此划拨的资金数额较大。1978年“改革

萨尼亚·阿雷齐纳  
香港大学, 香港, (中华人民共和国)  
塞尔维亚共和国政府, 贝尔格莱德 (塞尔维亚共和国)  
作为“负责任大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的对外投资援助模式

开放”政策开始, 中国领导层开始减少为此目的划拨的资金, 主要是因为需要将资金转向国家现代化 (Selden, 1978)<sup>2</sup>。只有在21世纪初, 由于经济增长迅猛, 财政资源雄厚, 中华人民共和国才再次为此目的在双边和多边一级拨出大量资金。

尽管一些西方作者对中国投资和对外援助的动机表示怀疑, 但作者假设中国领导层正在开发一种投资和对外援助模式, 以表明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有助于解决重要的全球问题 (Zoellick, 2005)。同时致力于实现最重要的目标——到2049年实现“中国梦” (Gong, 2013)<sup>3</sup>。

前段时间, 对外投资援助模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投资援助的一般情况。最重要的是, 关于在国外提供投资和援助的结构、范围和方式以及执行这一政策的机构的数据。<sup>4</sup> 本研究的重点是影响中国领导层在北京共识的基础上发展对外投资援助模式的因素。为了证明这一基本假设, 作者运用结构函数分析法进一步解释了中国的投资和对外援助模式, 以及对周边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影响。本文还运用比较分析的方法, 将这一模式与基于华盛顿共识的西方模式进行了比较, 并将中国的多边对外援助制度与西方的OECD援助制度进行了比较。研究将使用相关的学术文

---

2 当时,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世界上20个最不发达国家之一,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208美元。

3 在2012年11月中共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 习近平主席提到了“中国梦”的愿景, 这一构想后来被解释为通过改革发展, 建成小康社会。

4 以下是本文的研究内容: Wolf, C. J., Wang, X., Warner, E. (2013). *China's Foreign Aid and Government Sponsored Investment Activities – Scale, Content, Destinations and Implications*. Washington D. C.: RAND Corporation; Brautigam, D. (2009). *The Dragon's Gif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režina, S. (2018). *China in Europe*. Belgrade: Institute of European Studies et al.

献和政治文献、官员的声明和国际媒体的新闻。为了真实性，作者与官员、分析师、研究人员和记者进行了非正式交谈，他们直接参与了中国在海外投资和援助的各个方面。

本文有五个组成的部分。在介绍部分，作者陈述了研究的背景，解释问题的本质并提出了假设。第二部分介绍了中国对外投资援助的历史。在第三部分，她列举了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对外投资援助模式的因素。第四部分阐述了对对外投资援助的类型和方式。结论部分总结了本文的研究成果和得出的结论，并对中国对外投资援助政策的发展方向进行展望。

### 中国对外投资援助的历史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虽然由于失去了西方的支持而面临封锁和禁运，但开始对外提供投资和援助。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北京为此拨出的资金相当大，主要用于支持民族独立和经济发展。197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继续对外提供投资和援助，主要是为了对抗苏联的影响。援助对象主要是与之发展了政党关系的社会主义国家、马列主义运动和一些周边国家 (Brautigam, 2009年, 第32页).<sup>5</sup>

在1971年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后，北京正慢慢开始减少为此目的划拨的资金。究其原因，是文化大革命、“大跃进”政策后，经济社会遭到破坏，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多少东西可以奉献给自己的人

---

5 主要涉及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越南，朝鲜和柬埔寨等国。

萨尼亚·阿雷齐纳  
香港大学, 香港, (中华人民共和国)  
塞尔维亚共和国政府, 贝尔格莱德 (塞尔维亚共和国)  
作为“负责任大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的对外投资援助模式

民,更不用说世界了。这就是为什么它必须转向本国的发展、改革和现代化,为此,它首先需要和平的环境。然而,伟大的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始终坚持“对外援助过去是正确的,现在也是正确的,中国发展以后也会是正确的”的主张。他将通过推行“改革开放”、“外交微笑”和“二十四字方针”(“耐心”政策;为外交政策和经济变革奠定基础; Kissinger, 2011年,第539页)<sup>6</sup>,在随后的35年内,中华人民共和国将从一个在经济和社会上遭到破坏的及国际孤立的国家,转变为一个强大而有影响力的国际社会成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功地实施了经济现代化战略,其第一步就是“欢迎外国的大量投资进入”(迎进来)从而克服了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没有出现任何重大问题。20世纪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中国的储蓄率和外汇储备率都很高(Cheng, 2014年,第1433页;贸易经济学, 2017年)。<sup>7</sup>这使得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开始了经济现代化的第二阶段——走向国外市场的政策(走出去),以深化对国外市场、自然资源和先进技术的准入,带来额外的增长和稳定。这一政策被列入“十五”计划(2001-2005年), Arezina, 2016年,第14页)。这意味着北京将恢复为投资和对外援助拨出更多的资金。

在“十一五”(2006-2010年)规划中,政府鼓励企业“进一步走出去”,从房地产和股市的投机性投资中转移更多的资本,并缓解人

---

6 1991年,邓小平制定了这一政治意愿,这是中国外交政策行为的基础:“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

7 200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储备达到2000亿美元,此后外汇储备开始快速增长,到2020年底达到3.2万亿美元。

民币的压力。国务院决定继续深化投资体制改革。国家发改委编制了一份中国直接投资应投向的自然资源和技术清单。焦点已经从香港和澳门、北美洲和西欧转移到亚太、非洲、拉丁美国和中东欧（16+1，2016年）。

在采用这个文件之后，中国领导层通过了“十二五”（2011-2015年）规划，推动了“走出去”政策的延续。重点是“包容性增长”，即深化分销网络和知名度，以及获取先进技术和研发机会（Sagers, 2012年）。2011年4月，国务院发布了第一份《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援助白皮书》，提出了以下原则：“向国外提供援助时，中国正在尽最大努力帮助受惠国（……）为未来的发展和独立进程奠定基础[……]中国从不以援外作为干涉受援国内政或谋求自身政治特权的手段。”（中国国务院，2011年）。

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全球金融市场的持续不稳定以及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放缓，促使许多发展中国家采取外国直接投资政策，以此实现经济增长，创造更好的投资环境。这对中国的计划产生了积极影响，为中国在世界各国和地区投资开辟道路（16+1，2016）。

“十三五”规划（2016-2020年）以中国社会改革为重点，将改革与先进技术相结合。中国领导层认为，中国作为为第三方市场生产廉价产品的廉价劳动力时代已经结束。全球经济放缓导致对中国出口产品的需求下降。中国的竞争力下降了；中国产品的价格上涨是由于活跃劳动力减少导致工资上涨；这是老龄化社会的结果（由于“独生子女”政策，以及由于中国企业对环境保护日益增长的需求而进行的投资）。此外，由于中国企业对环境保护的需求日益增

萨尼亚·阿雷齐纳  
香港大学, 香港, (中华人民共和国)  
塞尔维亚共和国政府, 贝尔格莱德 (塞尔维亚共和国)  
作为“负责任大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的对外投资援助模式

长, 因此他们进行了大量投资。因此, 有必要调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结构, 从以廉价劳动力为基础, 为第三市场生产廉价产品的投资模式, 转变为以生产先进技术为基础的消费模式, 这些技术将被中国人购买 (Zapoljskis, 2016年)。因此, 中国领导层在2015年公布了“中国制造2025”战略 (中国制造2025; Lemton, 2015年, 第38页)<sup>8</sup>, 最早于2017年8月通过限制性法规, 加强对出境金融资源的控制, 以加强经济, 减少对政府不感兴趣、也不符合国家长期目标和规划的部门的投资 (Xu, 2017年)。

新的“十四五”规划 (2021-2025年) 考虑到了新的国际形势和新型冠状病毒的影响。根据这一规划, 它侧重于“双循环”。这应该能够利用全球化的所有好处, 同时利用自己的能力。这意味着, 前期通过投资和援助走出国门的财政资源将有一部分有所减少, 旨在加强中国经济。最终目标是中国社会实现自给自足, 独立于欧洲、美国或非洲市场, 形成一个“中产阶级社会”, 生活水平足够高, 能够从中国企业购买高科技产品 (Arezina, 2018年, 第17页)。

按照这些规划, 中国领导层同时发起的各项举措和项目也进行了调整。最大的和全球最著名的“一带一路”倡议于2013提出, 目的是连接欧亚大陆 (西欧和中国东部) 两个经济发达的部分, 也包括其他大陆——非洲、南美洲和澳大利亚。据估计, 这个项目涉及约44亿人 (占世界人口的64%), 以及占世界GDP 40%左右的国家。根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17的报告, 该项目的价值预计将达到一千多

---

8 该战略旨在加强中国的高科技产业, 并将这些产品销往世界各地。

亿美元，这将创造几百万人的就业机会，并产生超过1000亿美元的税收。这就是为什么习近平主席把这些项目称为“世纪工程”。这些项目应该给“新丝绸之路”沿线的所有国家带来福祉（Kynge, Wheatley, 2020年12月11日）。

### 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对外投资援助模式的因素

几十年来，许多因素影响了中国领导层继续投资和对外援助政策。其中一些因素在一定时期内才极为主导，后期影响减弱，其他因素影响增强，而有的因素始终不变。因此，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将列在下面。

第一个因素是中国领导层希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一个伙伴，使各国，特别是与之有良好关系的国家能够依靠它。这一因素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仍然是相关的，当时北京本身由于失去西方的支持而与封锁和禁运作斗争。中国领导人认为，为了使中华人民共和国通过与西方国家的合作，打破西方的经济封锁，有必要向所有希望独立和发展经济的国家提供支持。冷战结束后，作为西方华盛顿共识的对应物。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了自己的“市场列宁主义”提供经济援助的模式，称为“北京共识”（Cooper-Ramo, 2004年, 第39页）。

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投资和提供援助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满足国内市场对重要资源的需求和海外市场对国内产品分销和销售的需求。为了实现这一外交政策目标，中国二十年来一直致力于发展投资模式，注重走出去政策，并指出需要与世界各国进行互利共



萨尼亚·阿雷齐纳  
香港大学, 香港, (中华人民共和国)  
塞尔维亚共和国政府, 贝尔格莱德 (塞尔维亚共和国)  
作为“负责任大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的对外投资援助模式

赢的合作 (Zha, Breslin, 2010年, 第67页 )<sup>9</sup>。

另一个重要因素是, 由于担心失去美元的购买力, 中国政府需要释放外汇储备, 特别是美元储备, 并将其转为黄金和其他货币 (所谓的去美元化)。其原因是对美元作为储备货币的不满, 由于美元不断大量印发, 主要是由于美国政府支出的增加, 美元在世界范围内不断增加。这导致了所有那些阻止美元失去购买力的人的恐惧 (Arezina, 2018年, 第94页)。

第四个重要因素是中国企业和人民币国际化的需要。为此, 中国领导层使中国国有和中型私营企业得以进入国外市场。这些公司基于各种经营战略, 接受中国金融机构的资金援助, 并将其作为对其他国家和世界各地需要投资各种项目的公司的投资。同时, 他们还通过创建国际投资组合, 吸收发展国内经济所需的知名品牌和先进技术, 提高了知名度 (Hong Hou, 2017, 第55页)。

第五个重要因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需要增强“软实力”。也就是说, 除了世界上存在的1000多所“孔子”学院和在国际上宣扬“中国梦”的中国文化中心外, 对外提供投资和援助有助于中国文化的国际化, 成为文化外交的一种形式。(仿效法语国家组织、英国文化协会和歌德学院; Arezina, 2018年, 第98页)。

第六个因素是加强中国在国际组织中的地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致力于这方面的工作, 以便在联合国 (代替台湾)、其专门机构和其他国际组织中占有一席之地 (Miljanic、

---

9 出口部门雇用多达4500万中国工人, 约占中国内地在职劳动力的6%。

1996年,第30页)。为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在20世纪50年代建立了有别于西方国家的典型的经合组织援助框架的独立的对外多边援助机制,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全球和区域多边发展组织建立了相对密切的伙伴关系。近几年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提供多边援助的方式和形式变更多了,用于多边援助的资金大幅增加。同时,北京还发展了自己的多边发展机构,如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Hong Hou, 2017年,第11页)。

同时,通过发展对外投资和援助模式,中华人民共和国希望积极影响西方国家和国际组织增加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和援助,减少政治条件(Milanovic, 2021年5月21日)。因此,在2017,美国开始与美国合作伙伴“安静地讨论”如何建立与“一带一路”倡议相关的可供选择的融资机制,提供给需要资本流入的国家。在这方面,已与日本国际合作银行和欧洲开发金融机构协会签署备忘录,以促进在发展中国家“可持续投资”方面的合作,并促进“民主价值观、自我维持的社会和加强最佳做法”(Smith, 2018年)。两年后的2021年3月下旬,美国总统拜登向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提议,建立一个价值数千亿美元的基础设施计划,作为上述中国在发展中国家倡议的替代方案(2021年3月26日, Aljazeera)。类似的合作,也在印太地区进行。2021年4月中旬,拜登总统向日本首相菅义伟提出(Miki, 2021年4月6日)。

然而,最重要的因素可能是维护领土完整和恢复中国在“屈辱世纪”中失去的所有领土。《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提出,国家统一的“神圣目标”是每个中国人的任务,也是必然的历史进程

萨尼亚·阿雷齐纳  
香港大学, 香港, (中华人民共和国)  
塞尔维亚共和国政府, 贝尔格莱德 (塞尔维亚共和国)  
作为“负责任大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的对外投资援助模式

(Medeiros, 2009年)。通过加强与世界各国的伙伴关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在努力实现自己的目标, 并同时为其他国家带来好处。

## 中国的投资和对外援助

自21世纪初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经济稳定以来,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越来越大。也就是说, 1982年至1989年外国直接投资不足5亿美元的时期不同; 1990年至1999年, 这一数字上升到刚刚超过20亿美元, 而2000年,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不足23亿美元。随着2001年“走出去”政策的实施, 中国的直接投资有所增加。其中大部分是通过兼并、收购已有的知名企业或建立合资企业进行投资。因此, 中国在海外的投资在2005年达到724亿美元, 并逐年增加, 2015年达到1356亿美元 (Blanchard, 2017年4月14日)。据估计, 从“改革开放”开始到2020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世界的直接投资超过1500亿美元 (World Economic Forum, 2017; EY, 2021年)。这超出了Daniel Rosen和Thilo Hanemann的预测, 他们在2010年声称, 到2020年, “中国在世界上的直接投资流量将大大超过1000亿美元, 其中相当一部分将用于发达市场” (Rosen, 2009)。

由于中国资本在海外没有计划和合理的投资, 2017年8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层通过了一些限制性法规, 以加强对金融资源出境的控制, 从而加强中国经济, 减少对非中央部门的投资。对于政府来说, 也不符合国家的长期目标和指示。在这方面, 国务院和国家发改委将外商直接投资与国家政策重点相协调, 确定了禁止、限制和鼓励三类直接投资。因此, 2017年中国海外直接投资下降了46%

，因为根据建议，海外房地产、酒店、电影院和娱乐业的投资大幅减少，对该“一带一路”倡议的投资增加。(Xu, 2017年8月28日)。

在对外援助方面，北京在《北京共识》的基础上发展了自己的模式——有中国特色的援助。这种模式不采用“大棒加胡萝卜”的政策，不同于西方模式。这种模式植根于撒切尔夫人和里根的思想，即华盛顿共识，这是建立在一系列措施的基础上的。这些措施被称为“休克疗法”，例如巩固国家预算、财政纪律等。这一模式符合中国的实用主义和理想主义，以1954年确立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964年周恩来非洲之行发表的《中国对外援助八项原则》、《经济技术合作四项原则》为基础，赵紫阳1983年初访非<sup>10</sup>与“走出去”政治合著 (Bernasconi-Osterwalder et al., 2013年, 第1-2页)。同时，中国的援助模式基于三个原则：创新和因地制宜（采用先进技术而不是传播低水平技术）、可持续性和稳定性（投资于基础设施和自然资源）和可持续性维护独立（不干涉受惠国国内政治，作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之一；Jurisic, 1999年, 第38页）。

中国对外援助分为双边援助和多边援助。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外提供的双边援助至少有九种：医疗队、培训和奖学金、人道主义援助、青年志愿者、债务减免、预算支持、交钥匙工程（基础设施、工厂等）、实物援助和技术援助。其中一些类型的援助已经实施了很长时间，而另一些则是全新的 (Bernasconi-Osterwalder et al., 2013年, 第105页)。<sup>11</sup> 然而，提供财政援助的方式主要有三

---

10 这些原则规定，提供技术和管理合作不是干涉国家内政，而是有助于建立自信。

11 约42%的受资助项目涉及自然资源开发项目，40%涉及基础设施项目以及与矿石、矿产和金属有

萨尼亚·阿雷齐纳  
香港大学, 香港, (中华人民共和国)  
塞尔维亚共和国政府, 贝尔格莱德 (塞尔维亚共和国)  
作为“负责任大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的对外投资援助模式

种: 赠款 (无需偿还的援助)<sup>12</sup>、无息贷款和优惠贷款。

在多边援助方面,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20世纪50年代建立了自己的对外援助体系, 并这些系统存在在西方国家典型的经合组织援助框架之外。原因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仍然宣称自己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来自北京的援助与通过经合组织体系获得的援助相比, 在赠款中所占比例较低。这就是为什么西方机构经常将中国在海外的援助列为官方发展资金的原因 (而不是作为官方发展援助; Hong Hou, 2017年, 第51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全球性和区域性多边发展组织建立了较密切的伙伴关系 (Hong Hou, 2017年, 第51页)。最初, 中国的对外多边援助只包括两种形式的援助: 赠款和加入国际组织的付款。随着对外提供多边援助制度的发展, 更多提供援助的方式出现了: 捐赠和国际组织会费、资本融资和贷款以及与国际组织的项目合作 (Jurisic, 1999年, 第38页)。

中国消息称, 1950年至2016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援助4000多亿元人民币, 启动项目5000多个, 完成项目近3000个,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举办培训项目1.1万多期260多个, 覆盖2000名来自其他发展国家的工作人员 (World Economic Forum, 2017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的数据, 仅在2013-2018年期间, 中国金融机构

---

关的项目, 18%涉及港口、学校、发电厂建设项目, 例如政府拨款、人道主义和技术援助。

12 应区分赠款, 主要是以人民币为主要货币的赠款, 以及现金捐赠, 这是对紧急情况或灾难的快速援助方式, 主要使用美元。

就安排了2702亿元的对外援助，分为赠款、无息贷款和优惠贷款三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2021年）。这类援助的一部分，相当于2600个项目，价值3.7万亿美元，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启动了（Aljazeera, 2021年3月26日）。

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的出现导致中国经济增长率从2019年的6%降至2020年的2.3%（Cheng, 2021年）。这导致了“双循环”政策的出台，根据这一政策，中国金融机构将把一部分资金转向国内市场，而其余资金将继续流向国外（Kynge, Wheatley, 2020年12月11日）。

尽管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的出现导致中国对外援助从2016年的峰值750亿美元大幅下降到2020年的40亿美元（Kynge, Wheatley, 2020年12月1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意识到其“负责任大国”的作用，202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始发展“一带一路”倡议的新组成部分：“一带一路”健康之路。作为其中的一部分，北京向发展中国家提供了20亿美元的援助，以支持各国应对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和经济社会复苏。中国领导人提供了3亿剂新冠疫苗，其中向80多个急需疫苗的发展中国家提供免费疫苗援助，向43个国家出口疫苗。此外，由于最贫穷国家公共预算形势困难，中国已减免了这部分国家21亿美元的债务，并同意为23个国家提供再融资，价值13亿美元（Qiu Woo, 2020年11月20日）。在2021年5月21日举行的全球健康峰会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宣布将在未来3年内再提供30亿美元国际援助，用于支持发展中国家抗疫和恢复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本国疫苗企业向发展中国家进行技术转让，开展合作生产（新华社，2021，5月21日）。

萨尼亚·阿雷齐纳  
香港大学, 香港, (中华人民共和国)  
塞尔维亚共和国政府, 贝尔格莱德 (塞尔维亚共和国)  
作为“负责任大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的对外投资援助模式

## 结论

本研究的出发点是长期的对外投资和援助政策,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中国领导层开始实施这项计划。分配给这个目的的资金数额根据中国领导层管理国家的情况而有所不同。然而, 这种与周边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合作从未放弃。这种合作即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接受援助的国家一样贫穷的时期仍然存在, 而且其优先事项是将所有财政能力用于自己国家的经济发展。

为了证明这一假设, 最重要的是中国领导人参与解决重要的全球问题, 同时致力于实现最重要的目标——到2049年实现“中国梦”。在研究过程中, 作者着重分析了影响中国领导层在北京共识的基础上, 提出了一种特殊的对外投资援助模式。在研究过程中, 得出了一些因素只是在一定时期内处于极端主导地位, 后来影响减弱, 其他因素的影响增强, 而一些因素则一直保持不变的结论。尽管中国在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和新型冠状病毒流行期间的工作重点发生了变化, 但所有这些因素都对领导层寻求双赢解决方案、继续向海外提供投资和援助产生了积极影响。

同时, 作者得出结论: 投资与对外援助模式与基于华盛顿共识的西方模式存在显著差异; 中国的多边对外援助体系与通过OECD体系获得的援助不同, 这是西方国家的典型特征。通过发展与西方的竞争, 这种模式大大有助于增加海外(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和援助。虽然中国领导层对外投资援助的方式和资金分配发生了变化, 但这种模式几十年来一直是中国外交政策的焦点。

对此,她指出,在几十年的发展过程中,中国领导层试图控制和指导这一模式的发展,使之与中国资本合理投资海外的计划相协调。因此,2017年8月,政府颁布了一些限制性法规;这些条例旨在加强对国家财政资源的控制,恢复中国经济,减少对中国政府不感兴趣、不符合国家长期目标和指示的部门的投资。根据这些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后几年对外投资的资金减少了(仅2017年就减少了近46%)。

在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爆发和中国经济增长显著下降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资金数额出现了新的变化。尽管需要将国外的部分资金转向国内市场的发展和实现“中国梦”的长远计划,但作者指出,中国领导层并没有放弃让中华人民共和国继续在国外存在的意图。在这方面,他们推出了“一带一路”倡议的新组成部分——丝绸的健康之路——为国际社会在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期间提供了重大帮助。

最后,结合研究结果,作者得出结论:中国对外投资援助模式为周边国家和国际社会感受到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的好处做出了巨大贡献。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世界上贸易额第一的国家、第二经济大国、外汇储备最大的国家、联合国维和行动人力资源最大的捐助国,贫困现象得到彻底消除。在2020年新冠病毒大流行爆发后,中国第十三代领导层采取了非常负责任的行动。他们呼吁国际社会合作,公平地分发疫苗,并放弃疫苗的知识产权;它减免了21亿国家对最贫穷国家的债务,并同意为23个国家的债务再融资,价值13亿美元(新华社,2021年)。这一切都表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有助于解决重要的全球性问题,同时又致力于实现



萨尼亚·阿雷齐纳  
香港大学, 香港, (中华人民共和国)  
塞尔维亚共和国政府, 贝尔格莱德 (塞尔维亚共和国)  
作为“负责任大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的对外投资援助模式

最重要的目标——到2049年实现“中国梦”。

根据2021年1月10日发表的新的《国际发展合作白皮书》(其中“援助”一词改为“发展”), 作者预计, 今后一段时期, 北京将继续以经济增长助力全球发展, 随着对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间和结束后将发生的新情况的不可避免的调整。

## 参考文献/REFERENCES

- 16 + 1 (2016, January 11). Analysis of China's Investment in CEECs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http://16plus1-thinktank.com/1/20160111/1091.html>. [英语]
- Aljazeera. (2021, March 26). Biden suggests creating initiative to rival China's Belt and Road. <https://www.aljazeera.com/economy/2021/3/26/biden-suggests-creating-initiative-to-rival-chinas-belt-and-road>. [英语]
- Arežina, S. (2014). Chinese 'going out' policy and its impact on relations with Serbia.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LXV (1153–1154), 5–23. [塞尔维亚语]
- Arežina, S. (2018). *China in Europe*. Belgrade: Institute of European Studies. [In Serbian]
- Bernasconi-Osterwalder, N. et al. (eds.) (2013). *Chinese Outward Investment: An emerging policy framework*. IISD, [http://www.iisd.org/pdf/2012/chinese\\_outward\\_investment.pdf](http://www.iisd.org/pdf/2012/chinese_outward_investment.pdf). [英语]
- Blanchard, J.-M. F. (2017, April 14). The Security Implications of China's Overseas Investment Boom. *The Diplomat*, [https://www.ey.com/en\\_cn/china-overseas-investment-network/overview-of-china-outbound-investment-of-q1-2021](https://www.ey.com/en_cn/china-overseas-investment-network/overview-of-china-outbound-investment-of-q1-2021). [英语]
- Brautigam, D. (2009). *The Dragon's Gif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英语]
- Cheng, E. (2021, January 17). China says its economy grew 2.3% in 2020, but consumer spending fell. *CNBC*. <https://www.cnbc.com/2021/01/18/china-economy-release-of>

fourth-quarter-full-year-2020-gdp.html. [英语]

Cheng, Y. N. (2014). Virtual trading assessment techniques based on China's foreign exchanges reserves data. In: H.-C. Liu, W.-P. Sung, W. Yao (eds.). *Computer, Intelligent Computing and Education Technology*. London: Taylor & Francis Group. <https://doi.org/10.1201/9781315760810> [英语]

Chow, L. (2021, February 8). Overview of China outbound investment of 2020. *EY*. [https://www.ey.com/en\\_cn/china-overseas-investment-network/overview-of-china-outbound-investment-of-2020](https://www.ey.com/en_cn/china-overseas-investment-network/overview-of-china-outbound-investment-of-2020). [英语]

Cooper Ramo, J. (2004). *The Beijing Consensus*. London: The Foreign Policy Centre. [英语]

Gong, W. (2013, November 23). Chinese Experience of Development. Lecture, Seminar „China's issues“. Beijing: Chinese Academy of Governance. [英语]

Hong, Z., Hou, X. (2017). *China's Foreign Aid*, Singapore: Springer. [英语]

Hsu, S. (2017, August 28). China's New Capital Controls Expected to Slow Real Estate, but improve Country's Economic Health. *Forbes*. <https://www.forbes.com/sites/sarahsu/2017/08/28/chinas-new-capital-controls-expected-to-slow-real-estate-but-improve-countrys-economic-health/#6e2de76f66fd>. [英语]

Jurišić, K. (1999). Half a century of the PR China. *Politička misao*, XXXVI (3). 34—44 [塞尔维亚语]

Kissinger, H. (2011). *On China*. New York: Penguin Press. [英语]

Kynge, J., Wheatley J. (2020, December 11). China pulls back from the world: Rethinking Xi's 'project of century'. *Financial Times*. <https://www.ft.com/content/d9bd8059-d05c-4e6f-968b-1672241ec1f6>. [英语]

Lempton, D. M. (2015). *Follow the leader*. Beograd: CIRSD. [塞尔维亚语]

Medeiros, E. S. (2009). *China as International Actor: Activism, Opportunism and Diversification*. Santa Monica: RAND Corporation. [英语]

Miki, R. (2021, April 6). US and Japan plan 'Belt and Road' alternative for Indo-Pacific. *Nikkei Asia*. <https://asia.nikkei.com/Politics/International-relations/Indo-Pacific/US-and-Japan-plan-Belt-and-Road-alternative-for-Indo-Pacific>. [英语]

萨尼亚·阿雷齐纳  
香港大学, 香港, (中华人民共和国)  
塞尔维亚共和国政府, 贝尔格莱德 (塞尔维亚共和国)  
作为“负责任大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的对外投资援助模式

Milanović, B. (2021, May 21). Competition Can Be Good for the Developing World. *Foreign Affairs*.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china/2021-05-21/competition-can-be-good-developing-world?utm\\_campaign=fb\\_daily\\_soc&utm\\_source=facebook\\_posts&utm\\_medium=social](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china/2021-05-21/competition-can-be-good-developing-world?utm_campaign=fb_daily_soc&utm_source=facebook_posts&utm_medium=social). [英语]

Miljanić, D. (1996). The oscillations in the US-China relations. *Međunarodna politika*. XXXXVII (1042) 29-32 [塞尔维亚语]

Qiu, S., Woo, R. (2020, November 20). China says has given \$2.1 billion of debt relief to poor countries. *Reuters*.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china-debt-g20-idUSKBN28009A>. [英语]

Rosen, D. H., Hanemann T. (2009). China's Changing Outbound Direct Investment Profile: Drivers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Policy Brief PB09-14*. Washington: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英语]

Sagers, C. (2012, May 10). China's 'Going Out' Strategy. *Diplomatic Courier*. <http://www.diplomaticcourier.com/news/regions/brics/952?showall=1>, 20. 6. 2017. [英语]

Selden, M. (ed.). (1979).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Revolutionary Change*. New York & London: Monthly Review Press. [英语]

Smith, J. (2018). 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Strategic Implications and International Opposition. The Heritage Foundation. <https://www.heritage.org/asia/report/chinas-belt-and-road-initiative-strategic-implications-and-international-opposition>. [英语]

The State Council of the PR China. (2011, April 21). China's Foreign Aid 2011. [http://english.gov.cn/archive/white\\_paper/2014/09/09/content\\_281474986284620.htm](http://english.gov.cn/archive/white_paper/2014/09/09/content_281474986284620.htm). [英语]

The State Council of the PR China. (2021, January 10). Full text: China's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in the New Era. [http://english.www.gov.cn/archive/whitepaper/202101/10/content\\_WS5ffa6bbbc6d0f72576943922.html](http://english.www.gov.cn/archive/whitepaper/202101/10/content_WS5ffa6bbbc6d0f72576943922.html). [英语]

Trading Economics. (2017, August 31). China Foreign Exchange Reserves 1980–2017. <https://tradingeconomics.com/china/foreign-exchange-reserves>. [英语]

World Economic Forum. (2017, January 17). President Xi's speech to Davos in full. <https://www.weforum.org/press/2021/01/president-xi-jinping-s-speech-at-davos-agenda-is-historic-opportunity-for-collaboration/>. [英语]

- Xinhua. (2021, May 21). Remarks by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at the Global Health Summit. [http://www.xinhuanet.com/english/2021-05/21/c\\_139961512.htm](http://www.xinhuanet.com/english/2021-05/21/c_139961512.htm). [英语]
- Zapoljskis, A. (2016, March 17). China has announced that it will triple the standard of living for 70 million people a year. *Fakti*. <http://fakti.org/globotpor/kina/kina-objavila-da-ce-utrostrucavati-zivotni-standard-za-po-70-miliona-ljudi-godisnje>. [塞尔维亚语]
- Zha D., Breslin S. (2010). Oiling the weels of foreign policy? Energy security and China'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Shaun Breslin (ed.) *Handbook of China'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64--75). London: Routledge International Handbook. [英语]
- Zoellick, R. B. (2005, September 21). Whither China: From Membership to Responsibility?. Remarks prepared for delivery to National Committee on US-China Relations. New York City: US Department of State. [英语]